

从支持到禁运：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 进程中英国立场的考察

靳小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二战及战后一段时期内，在英国式渐衰落、非殖民化和冷战态势相互交织的情况下，英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不懈地致力于维持对东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与控制。在法国重返越南的进程中，丘吉尔联合政府与艾德礼政府从外交与军事两个层面给予法国不懈的支持；印度支那战争爆发后，艾德礼政府转而顺应印缅舆论，对法国采取有条件的武器禁运政策。从支持到禁运立场的调整，既反映了英国政府在战后地区民族主义问题上与法国相迥异的视角与立场，同时也是英国战后总体战略收缩困境下，艾德礼政府为维持英联邦内部的团结、保有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话语权而开展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

关键词：英国；法国；印度支那；非殖民化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5)06-0129-06

二战后英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是英国非殖民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重返东南亚之初，一方面军事上武力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另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整安抚地区民族主义国家的反法呼声，以此维持英国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迄今为止，学界对英国政策演变研究多集中于对英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整体性立场考察^①，且多强调地区局势演变中艾德礼政府的被动应对，鲜有成果注意到艾德礼政府在维持英法同盟关系与争取地区民族势力支持之间的互动决策考虑。本文拟撷取英国政府在法国重返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决策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法国重返进程中与英国之间的合作与分歧，探究英国立场及其调整的决策考虑，进而揭示印度支那地区民族运动与英国维持在该地区影响力这组矛盾如何推动英国政府的决策，以期丰富学界对英国在东南亚地区非殖民化与亚洲冷战格局形成的研究。

一、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

以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为界点，法国本土及海外殖民地相继落入德日占领之下，对于戴高乐流亡政府来说，恢复法国本土及海外殖民地不仅具有迫切

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成为振兴法兰西民族、恢复法国在国际社会中大国地位的象征。在这一问题上，丘吉尔联合政府坚定地站在戴高乐一边，不仅公开拒绝承认贝当政府的合法性，坚持承认戴高乐组建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为法国唯一合法政权，并声明为“完全恢复法国领土、殖民地和属地”而努力。^[1]

时年9月，作为法国海外殖民地核心利益的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亦由日军进驻，此后印度支那地区处于维希法国和日本共管之下，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1945年3月日本取缔法国殖民机构、扶植保大为首的傀儡政权上台。^[2]尽管如此，法国临时政府以会议和宣言的方式阐明了其对海外殖民地主权的声索。戴高乐对法国海外殖民地战后设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2月在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及宣言中，会议最终确立维持法兰西帝国统一，推进殖民地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通过给予殖民地半自治权来维持法国殖民地治理的官方立场，但声明却没有提及任何给予殖民地完全自治的规划。此后，为获取英美等国对法国恢复印度支那主权的支持，法国临时政府于1945年3月24日发布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印度支那联邦与法国以及法兰西共同体的其他部分组成‘法兰西联邦’，其外在利益由法国代表行使，印度支那将在这一联邦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3]这一声明

收稿日期：2014-11-04；修回日期：2015-03-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一般项目“英国与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07JA70016)

作者简介：靳小勇(1986-)，男，甘肃静宁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

实质上是布拉柴维尔精神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应用,成为战后法国政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的基础。“法兰西联邦”的设想,从表面上看是允诺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但更多的是强调战后法国对印度支那无可争议的拥有权。^[4]战后印度支那地区历史演进表明,法国政府并无意推进印度支那地区走向完全自治,这既成为法越之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也成为其与英国东南亚地区政策矛盾的源头。^[5]

对于戴高乐关于印度支那主权的声索,丘吉尔联合政府从一开始便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根据现有档案资料,罗斯福总统于1943—1945年先后两次向艾登和丘吉尔表示要推动战后印度支那交由国际托管。^[6]1943年3月27日,罗斯福与艾登会面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朝鲜与印度支那战后交由国际托管,艾登表示强烈反对这一设想;^②此后罗斯福寻求中华民国与苏联一并加入对印度支那托管国阵营,而蒋介石对托管并无兴趣。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中,丘吉尔对罗斯福总统提议再次表示强烈反对。梳理丘吉尔与艾登的表态不难发现,英国对托管提议的反对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倡导民族自决的反殖民主义的倾向使英国意识到,印度支那托管之争是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之间的较量,在这一关乎英国在东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战后国际地位的问题上,丘吉尔不容有失。如果允许印度支那交由国际托管,香港、马来亚、缅甸、新加坡可能会因此要求托管走向独立^{③[7]},势必危及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英国外交部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④其二,印度支那地区作为连接中国、印度、马来亚、新加坡等重要英国利益属地的陆上枢纽,将其置于盟友法国控制之下更符合英国在东南亚的地区利益。^[8]其三,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在欧洲促成一个强大的法国,是维持战后欧洲均势之需。二战使英国充分意识到英法一致在对德国法西斯与苏联可能威胁上的重要性。^{[8](35)}因此,反对“国际托管”,力主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成为丘吉尔联合政府的不二之选。鉴于丘吉尔联合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托管实施的难度,1945年4月2日,罗斯福终于妥协,授意国务卿斯特蒂纽斯(Edward Reilly Stettinius)起草声明“托管只适用于敌占区”及“愿意被置于托管之下的地区”。^{[6](A2)}因此,在罗斯福总统病逝(4月16日)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对印度支那的托管主张。杜鲁门上台后,对印度支那的处置则完全交由法国。

不仅如此,丘吉尔联合政府更以实际行动为法国

重返印度支那创造便利。戴高乐深知要在战后和平会议有关印度支那问题上具有话语权,法国必须在东南亚战场反攻日军进程中做出贡献,1943年10月,戴高乐向盟军司令部提出在1944年秋季之前组建一支远征军参加远东地区战役;同时,法国驻美大使亨利·海耶(Henri Haye)向马歇尔元帅要求取得盟军太平洋委员会的议席席位,这一请求被美国拒绝,及至1944年8月法国提出的任何关于加入东南亚战场的请求均被拒绝。^[9]与美国立场所不同的是,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坚持主张将法国远征军纳入到东南亚盟军序列中。1944年3月16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中,参谋长委员会属下的联合规划局的皇家空军代表道格拉斯·埃维尔爵士(Sir Douglas Evill)提出考虑法国为东南亚盟军提供帮助的请求;^⑤4月初,空军代表向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提出建议,提请注意利用法国力量的重要性;^⑥4月13日,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同意法国向东南亚盟军派遣远征军。在英国协助下,法国第五殖民地步兵团如期抵达锡兰准备进入印度支那;8月,英国正式要求美国承认法国代表布热佐将军在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的正式身份,并允许法国在印度建立海外军团训练基地,包括“黎塞留号”在内的法国远东舰队也开赴印度洋,为战后重返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准备。^{[9](37)}

英国政府的努力在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印度支那地区日军受降问题上,英美双方决议印度支那地区以北纬16度为界,16度以南由蒙巴顿统领东南亚盟军受降,16度以北由中华民国军队受降;同时约定在此后将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的全部纳入到东南亚盟军管辖之下。^⑦这一决议也为法国战后在英国协助下重返印度支那最终铺平了道路。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波茨坦会议对战后东南亚地区受降区划安排拉开了英法重返东南亚的序幕,同时也赋予了艾德礼政府在印度支那南部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支持殖民主义东山再起、协调东南亚战后秩序重建的责任,这也成为英国介入印度支那地区事务的开端;但协定中印度支那地区对日受降事宜的安排却是建立在潜在危机之上的,即印度支那地区民族主义与戴高乐政府殖民安排之间日渐无法调和的矛盾,对于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英法之间存有隐而未现的分歧。在重返进程中,艾德礼政府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恢复东南亚地区的战前秩序,而法国则以激进的军事手段来解决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纷争,这也成为英国调整对法政策的起点。

二、选择性禁运的决策考虑

波茨坦会议赋予了东南亚盟军在印度支那地区对日受降权力之后，推进在该地区对日受降事宜、促成法国重返并建立起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实际控制成为艾德礼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东南亚盟军进入印度支那后东南亚地区强烈的反法呼声以及英国国内舆论使得艾德礼政府开始调整其政策，这集中表现在随着印度支那战争升级，英国加速向法国移交该地区、并对法国采取武器禁运政策这一问题上。

在讨论英法重返印度支那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二战尾声时期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情况予以回顾。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印度支那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印度支那共产党适时做出了从亲日傀儡国家越南帝国夺取政权的决定^[10]，遂在西贡等地发动起义。8月2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9月2日，胡志明发布《独立宣言》，宣布“完全同法国脱离关系，废除与法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取消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一切特权”，并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10](5-6)}因此，在英法力量抵达印度支那之前，越盟活跃下的越南已经建立起了事实上的民族国家政权，新政权虽然并没有得到英法等国的承认，但成为横亘在法国重返之路中的重要障碍。

在推进印度支那地区受降事宜上，艾德礼沿袭了战时联合政府支持法国的立场，力图恢复东南亚地区战前秩序，并致力于维持该地区的局势稳定。据波茨坦会议协议，东南亚盟军进驻并解除北纬16度以南地区的日军武装，以俟法国军队到达后尽快予以移交。继8月15日受降区划发布，9月2日受降仪式结束之后^⑧，道格拉斯·格雷西(Douglas D. Gracey)少将率领东南亚盟军于9月13日抵达越南南部，通过与越盟军队的战斗夺回了西贡及周边地区，并于9月21日颁布了一份颇有争议的戒严令，禁止人民游行、公共集会和携带武器，否则会被射杀。与此同时，格雷西释放并重新武装了3月军事行动中被日军囚禁的法军，并于9月24日夺取西贡的邮局、电报等基础设施，以支持法国恢复在西贡的殖民机构。^⑨

本来，东南亚盟军在北纬16度以南受降是波茨坦决议的题中之义，然而英法在西贡及其周边对越盟军事行动招致了诸多非议^[11]，这一方面使英国认识到其低估了印度支那地区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其独立自主的诉求，同时也促使英国外交部重新审视东南亚的政策。蒙巴顿的政治顾问艾斯勒·德宁(Maberley Esler

Dening)建议英国应当尽快撤离印度支那，以避免给中国和美国落下英国资助法国镇压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口实^{[7](30)}，同时，他认为正确处理民族运动事件关乎该地区欧洲统治的生命，建议英国政府谨慎处理这一问题。^[12]

德宁的预言很快变为现实，处理该地区民族运动给英国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压力。首先是印度、缅甸以及东南亚国家强烈的反法呼声。印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在进驻印度支那的东南亚盟军中，来自印度的第20步兵军团占了极大比例^[13]，使用印军镇压越盟招致了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东南亚国家强烈抗议，尤其是印度民族主义者不断宣传英国使用印军在法国殖民地上镇压印度支那民族主义的情况下。^⑩尼赫鲁对使用印军在印度支那镇压越盟表示愤怒、羞愧和无助，表达了对印度支那局势的关切和抗议^{[8](108)}，这一抗议使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宣布拒绝法国军队通过印度进入印度支那；其二，鉴于印度军队在东南亚盟军中的重要性，保持与尼赫鲁政府关系对于维护英联邦的统一、维护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而印度国内的强烈抗议使英国决策人员意识到，日益增多的抗议会使印度政府面临的放弃其海外军事承诺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印双边关系恶化可能迫使英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计划。

其次是格雷西9月21日在未经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授意下颁布的禁止通令，不仅引发了越南民众的激烈抗议，在英国国内更是引发了对政府决策的质疑。在英国国内，58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艾德礼指责英国政府协助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这一行动得到了工党各层的支持；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亦表示对英印军队感到遗憾与羞愧。鉴于国内对格雷西行动的质疑与指责声，联合计划委员会建议受降完成后尽快撤出越南。^{[8](107)}在此情况下，蒙巴顿一方面坚称英国进驻印度支那是以受降恢复地区稳定而非支持法国殖民为己任^{[8](108)}，同时加快部署运输力量运送法军到达印度支那。截至12月底，印度支那地区法军达到21500人，这为英国力量的撤离后法国控制印度支那全境创造了条件。1946年1月底，格雷西所率领的印度军团已经撤离印度支那地区，同时法军已经按照预期占领了北纬16度以南印度支那全境。^[14]

东南亚盟军在国内外压力下的迅即撤离并没有消弭英法之间的分歧，虽然3月16日《法越初步协定》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自由国家^[15]，是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一份子^{[10](8)}，但双方对于交趾支那的主权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问题依然分歧巨

大。9月14日的《法越临时协定》为法国进一步做好战争准备赢得了时间。11月23日,法国炮轰越北第二大城市海防,造成6000多人死亡。这一军事行动表明法国政府开始借助激进的军事手段来解决与越盟之间的分歧,这与艾德礼政府谋求维持东南亚地区战后稳定局面的初衷渐行渐远。^{[16](275)}

随着法越之间冲突升级,印度和缅甸等国的反法呼声再度高涨。法国炮轰海防后不久,印度国大党中央委员会(All India Congress Committee)号召印度人民与印度支那人民并肩作战。同时,全印贸易工会联盟(All 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号召联合抵制法国舰船在印度港口停靠。1947年1月21日,加尔各答左翼学生将这天定为“越南日”,发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法国在越南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造成1名抗议者死亡,50多人受伤,约200人被捕。印度国内不断高涨的抗法援越呼声迫使尼赫鲁不得不在2月18日宣布禁止法国战斗机从印度空域通过。^[17]缅甸办公室也建议当局停止与法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理由是法国在印支殖民统治的方式遭到东南亚各国的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与法国开展密切合作并不是明智的选择。^⑩印度与缅甸的民族主义者志愿者甚至号召募集人员和资金组建自愿军以帮助越南抗法;泰国、锡兰以及马来亚和新加坡码头工会号召装卸工人拒绝为法国船只服务,迫使法国海军寻找其他的燃料补充点。

印缅等国强烈的反法呼声促使英国政府重新考虑与法国在军事层面的合作事宜,艾德礼政府对与法在印度支那军事合作问题上变得谨慎起来。1947年1月24日,法国军事代表团向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提出增加从新加坡武器采购数量的要求,这一请求迫使英国政府对法国军事行动做出明确表态。围绕援法武器供应问题,英国外交部观点分为两派,其中驻法大使达夫·库珀(Duff Cooper)主张完全满足法国要求,认为支持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的统治符合英国的利益,尤其是在与远东各国民族势力的周旋中,英法联合有利于维护英国的利益,同时也能促成与法国在殖民事务上结成联盟。^⑪然而这一意见遭到远东司官员戈登·怀特里奇(Gordon Whitteridge)的反对,他坚持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是逆潮流而动,英国政府不能因公开支持法国而使其在印度、缅甸、马来亚以及印度尼西亚陷入被动地位,进而影响到英国在远东的立场,并认为英国没有为法国提供武器的义务;怀特里奇进一步建议告知法国新加坡没有军火可以提供,但法国可以从其它任何地方购买军火,财政部可以要求不用预先付款。^⑫怀特里奇的建议得到了西方司官员莫伊尼汉(Moynehan)等人的支持,莫伊尼汉同样认为,法

国在印支的行动与英国立场形同异路,英法在欧洲结盟并不意味着法国可以在其属地问题上依靠英国。^⑬对此,德宁也持同样的观点。^⑭

艾德礼必须于英法合作与印缅舆论之间做出选择。2月11日的部际会议上,艾德礼表示,英国不应该从新加坡向法国提供武器,但并不反对从英国本土采购武器。^⑮英国政府同时知会法国,在新加坡的武器储备只是保障英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将会尽可能地满足法国从英国本土采购武器的请求。^⑯2月20日,也就是禁运决定做出9天之后,艾德礼首相宣布了未来十八个月内从印度撤军的决定。禁运政策也表明英国政府维持地区局势稳定的立场,这一政策将英国温和的地区政策与法国的军事行动区别开来,有利于在东南亚民族主义精英中塑造良好形象。在印缅走向独立已经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持续向法国输送武器势必会影响英国在该地区的声望,英国政府迫切需要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留在英联邦之内。^{[8](166)}从某种程度上讲,禁运政策是艾德礼政府顺应非殖民化潮流的举措,为英国政府在该地区继续发挥影响力创造了机会。^{[18](214)}

三、对英国立场调整的考察

总体来说,在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进程中,两届英国政府的立场经历了从全力支持向有条件的武器禁运的转变,笔者认为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禁运决策的酝酿背景和出台过程来看,亚洲各国、尤其是印缅强烈的反法呼声是促成英国谨慎向印度支那地区法军输送武器的直接原因。对法国采取禁运虽然有悖于英法在东南亚与欧洲事务上传统的合作关系,但在法国与越盟之间冲突升级后,艾德礼政府必须对印度、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舆论中强烈的反法呼声做出回应,这是法国决策中所无需考量的因素。禁运立场表明,在印度、缅甸行将独立之际出台合乎印缅民意的禁运政策,促成印缅从殖民地向自治的转变、加强英联邦国家内部的合作,比支持法国对艾德礼政府更具有现实意义。^⑰印度、缅甸舆论在这一时期能够影响到英国的决策,表明英国必须在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和支持法国之间取得平衡,而选择性的禁运同时也避免了将法国推向苏联阵营。

第二,从支持到禁运的立场转变表明,英法对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前景有着迥异的认知,由此也决定了两国在对待民族主义力量方式上的差异,这是促成英国采取选择性禁运的深层原因。英国战时推进殖

民地改革，允诺战后给予印缅独立地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蒙巴顿、德宁、怀特里奇、艾德礼等人坚持避免与地区民族主义者进行军事对抗，力求将英国塑造造成“合作者”而非“对抗者”，竭力避免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法国的“帮凶”^[19]，相形之下，法国战后恢复大国地位的迫切性、以及其国内多变的政治局势使主张推进印度支那改革的呼声无法成为政策制定的主流，而对民族主义诉求的忽视使重返印度支那成为再征服性质的军事行动，这与艾德礼政府战后推进殖民地改革、维持地区局势稳定战略相悖离，这一认知上的差异成为促成英国立场从支持转向禁运的原点。

第三，对于英国来说，虽然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有利于英国维持其东南亚利益，但在战后英国总体战略中，稳定的东南亚地区局势是英国在该地区发挥影响的前提。戴高乐政府对印度支那之于法兰西帝国复兴重要性的坚定认识是英国所无法左右的，尽管艾德礼政府期待并致力于地区局势稳定的恢复，但印度支那战争的爆发对英国来说是不可阻止的，因此采取选择性的禁运也成为英国唯一可行的立场。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在相继给予印度、缅甸和斯里兰卡独立地位之后，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核心利益为马来亚、新加坡等地，采取禁运以彰显自己与法国相形之下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温和立场，这一调整既有利于英国在东南亚地区利益的长久维持，也构成了英国战后非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促进了英帝国向英联邦转型。在英国力量逐渐退出东亚和南亚的大背景下，通过外交手段维持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事务中话语权，这也符合英国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调整。从长远来看，这一战略性的调整为其最终体面撤离亚太地区赢得了有益的战略空间和时间。

注释：

① 关于英国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研究成果有：Smith T O.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UK Policy in Indo-China, 1943-50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Neville P. Britain In Vietnam, Prelude to Disaster, 1945-6[M]. Routledge, 2007; Lawrence, M. A. Assuming the Burden: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War in Vietnam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Lowe P. Contending With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45-65[M].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Remme T. Britai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45-49 [M]. London: New York, 1995; Karl Hack. Defence and Decolon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 Brita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1967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T. O. Smith. Resurrecting the French Empire: British Military Aid to Vietnam September 1945—June 1947 [J]. University of Suss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7(11); Springhall

J. 'Kicking Out the Vietminh': How Britain Allowed France to Reoccupy South Indochina, 1945-46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5(1): 115-130. 国内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此问题放在英国非殖民化的角度来研究，如李安山. 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J]. 历史研究, 1995(1): 169-186; 倪学德. 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J]. 历史教学, 2005(8): 24-28; 李云飞. 1945—1955 年英法在东南亚的非殖民化政策比较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何跃. 论二战后英、法、荷在重返东南亚的合作与冲突[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195-202; 第二类则主要是在地区通史类著作中略有提及，如：梁志明. 东南亚近现代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②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27,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 FRUS), 1943, Volume III,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36-38.
- ③ Charles E. Bohlen, Bohlen Minutes, Roosevelt-Stalin Meeting, February 8, 1945, FRU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770.
- ④ Cadogan to Churchill, 13 March 1944, FO 371/41719, French Mission to Far East: Future of Indo-China. The National Archives, Public Record Office (以下简称 NA(PRO)), Kew.
- ⑤ War Cabinet, Meeting of the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of the War Cabinet, 16/3/44, COS (44) 88. [EB/OL]. <http://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addtobasket/C387266,2014-09-16>.
- ⑥ Foreign Office, Air Ministry telegram to SACSEA, 4 April 1944, FO 371/4348 F1716, NA(PRO), Kew.
- ⑦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to president Truman and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Babelsberg, July 24, 1945, No. 1381. J. C. S. Files. FRU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1465-1466.
- ⑧ White House, Directive by President Truman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in Japan (MacArthur), Aug. 15, 1945, FRUS, 1945, Vol. VII:530.
- ⑨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In Indo-China, Conflict In Indo-China,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Friday, Feb 07, 1947(50679):5.
- ⑩ Hollis to Prime Minister, Disturbances in Indo-China, 28 September 1945, PREM 8/63, NA (PRO), Kew.
- ⑪ Joint Planning Staff, "SACSEA's Plan for Reduction of Forces to Peacetime Strengths," 5 Feb. 1946, FO 371, File 54038, NA(PRO), Kew.
- ⑫ S H Hebblethwaite, Situation in French Indo China, FO 371/54046, F16726, 19 November 1946, NA(PRO), Kew.
- ⑬ Duff Cooper, Military Supplies for the French Forces in Indo-China, FO 371/63542, F 1201, Paris to FO, tel. 96 A, 29 January 1947. NA(PRO), Kew.
- ⑭ Gordon Whitteridge, Military Supplies for the French Forces in Indo-China, FO 371/63542, F 1035, 30 January 1947. NA(PRO), Kew.
- ⑮ Moynehan, Military Supplies for the French Forces in Indo-China, FO371/63542, F 1035, 31 January 1947. NA(PRO), Kew.
- ⑯ Esler Denning, Military Supplies for the French Forces in Indo-China, FO 371/63542, F 1201, 1 February 1947. NA(PRO), Kew.
- ⑰ Richard Allen, Military Supplies for the French Forces in Indo-China, FO 371/63542, F 10184, NA(PRO), Kew.
- ⑱ Foreign Office, FO to Singapore, tel. 375, FO 371/63542, F 1201,

14 February 1947, NA(PRO), Kew.

参考文献:

- [1] Walter La Feber. Roosevelt, Churchill, and Indochina, 1942—1945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5(5): 1277—1295.
- [2] René Cassin. Vichy or Free France? [J]. *Foreign Affairs*, 1941(1): 102—112.
- [3] General De Gaulle. Speech Made by General De Gaulle at the Opening of the Brazzaville Conference on January 30th 1944 [EB/OL]. <http://www.charles-de-gaulle.org/pages/stock-html/en/the-man/home/speeches/speech-made-by-general-de-gaulle-at-the-opening-of-the-brazzaville-conference-on-january-30th-1944.php>, 2014-09-16.
- [4] 陈剑. 维希法国远东政策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论文, 2011: 174.
- [5] Martin Shipway. *The Road to War: France and Vietnam, 1944—1947* [M].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 2003: 144—147.
- [6]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ietnam Task Force. Roosevelt's Trusteeship Concept, A12-A20, 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 1945—1967 [EB/OL]. <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pentagon-papers/>, 2014-03-18.
- [7] Lowe Peter. Contending with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45—1965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9.
- [8] Lawrence M A. Assuming the burden: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war in Vietnam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34.
- [9] Neville Peter. *Britain in Vietnam: Prelude to Disaster, 1945—1946* [M]. London: Routledge, 2007: 34.
- [10]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部. 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G].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2.
- [11]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Difficul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ndo-China: Efforts to Hand over to the French [EB/DL].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901—1959)*, Oct 27, 1945: 6.
- [12] Remme Tilman. *Britai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49*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67.
- [13] Jeffreys Alan.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Far East 1941—1945* [M].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5: 49.
- [14] Smith T O. Resurrecting the French Empire: British Military Aid to Vietnam September 1945—June 1947 [J]. *University of Suss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7(11): 1—13.
- [15] Jean Sainteny. *Ho Chi Minh and His Vietnam: A Personal Memoir* [M]. Chicago: Cowles, 1972: 102
- [16] Prasenjit Duara. *Decolo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275
- [17] Gilles Boque'rat. India's Commitment to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a War [J]. *Cold War History*, 2005, 5(2): 211—234
- [18]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4.
- [19] Our Diplomatic Correspondent. Byrnes Leaves [N].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1946-06-25(4).

From support to embargo: An analysis of Britain's positions on France returning to Indochina

JIN Xiaoyo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period of the World War II and the postwa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maintained its influence on southeastern Asia through diplomatic ways when the tendency of power declination,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became apparently interwoven. In the process of France returning to Indochina, the Churchill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Attlee Government gave supports to France at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levels. However, after the outbreak of Indochina war, Attlee government took arms embargo measures to France as a response to antiwar public opinions that arose in India and Burma. The adjustment of positions from support to embargo reflecte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positions between French government and British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Asian nationalism after the war, and also expressed part of diplomatic efforts that Attlee Government took to sustain the Commonwealth internal unity, and to maintain its influence on the southeastern Asia regional affairs in the shrinkage of Britain's postwar plight.

Key Words: Britain; France; Indochina; decolonization

[编辑: 颜关明]